

社會安全網下更生人從社會排除到社會融合的復歸途徑

劉慧冠

壹、前言

臺灣的家庭結構、型態的急遽的變化，已經影響家庭的樣貌與功能，加上少子化與人口老化問題，使得家庭的支持量能愈加薄弱。尤其這些年來，發生多起的家暴虐死及社會殺人事件，其成因大多與貧窮、失業、藥酒癮、精神疾病、重複入監、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家庭破裂等因素有關或因多重問題交錯而生（衛生福利部，2018），即長期被社會排除的更生人更容易陷入貧窮，而貧窮導致多面向社會排除經驗，如勞動市場排除、社會參與排除、人際關係排除、居住與活動排除等，進一步造成個人、家庭與社會關係的疏離、衝突。更生人更是容易因就業動機、就業技能不足、社會刻板印象及標籤化等多重就業障礙下，容易與社會脫節。更生人往往存在著多重脆弱性，需要更多支持與服務介入。更生人如無法獲得

非正式情感性的家庭支持或正式的社會資源支持下，將不利個人與家庭互動、社區適應及人際互動各方面等各社會生活層面的穩定。故更生人長時間的暴露在這樣的環境下，其所延伸的問題更應受到關注，故強化一個避免社會排除且具支持性與促進社會融合的社會安全網絡就更形重要。

貳、文獻探討

一、社會安全網

臺灣過去的社會矚目之重大社會治安事件或是家庭暴力事件，成因都與貧窮、失業、藥酒癮、精神疾病、社會排除、疏離、暴力行為、家庭或婚姻破裂等因素相關，而且各因素間也產生交互影響。例如因貧窮、失業與社會排除的交互影響，即長期被社會排除的人容易陷入貧窮，而貧窮導致多面向社會排除，例如社會參與排除、人際關係排除……等都可能是上述原

因交互影響關係而衍生，同時更容易造成個人、家庭與社會關係的疏離與衝突（劉慧冠，2020）。故檢視近年社會發生重大殺人、家庭暴力或兒虐致死及殺子自殺等重大社會事件，大多與上述交互影響與多重社會排除有關連。政府雖已設置相關單位及專業人力來提供協助，如政府或民間團體的高風險家庭服務、高關懷家庭、脆弱家庭、兒童保護服務或社會救助服務等，卻仍不時發生憾事或服務量能不足之情事。

爰此，蔡總統於2016年5月20日就職演說中揭示從治安、教育、心理健康、社會工作等各個面向強化社會安全網，期望讓臺灣未來的世代，生活在一個安全、沒有暴力威脅的環境中，故建構完善體系將有助於降低社會安全事件發生（衛生福利部，2018）。行政院更在2021年7月29日院臺衛字第1100180390號函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民國110-114年）」（衛生福利部，2021），同時請中央政府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落實推動，強化部會網絡資源布建，拓展公私協力服務等。其中透過強化法務體系與其他服務體系之銜接，以協助更生人能順利賦歸社會，將持續推動以司法保護為手段的再犯預防處遇措施、兼顧加害人再犯預防與被害人復歸社會的服務連結、建構司法精神醫療體系的有效資源連結，遂成為政府強化社

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的執行重點之一。

二、社會排除

林信華（2002）及孫碧霞（2018）的研究指出，社會排除的概念是起因多元且變動的因素，導致人們被排除在現代社會中之正式的交換、運作與權力之外，雖然貧窮是主要原因，但社會排除亦代表著無法合理享有住宅、教育及健康權利與服務，這對個人與群體產生影響，屬於工具性支持的社會基礎設施不足下所帶來的風險，所以我們不能就這樣的認命的與被動的接受不公平的社會排除。

Bauman（1998）也提出空間區隔、社會排除與剝奪，易形成「底層階級定罪化」的困境，「底層階級定罪化」是一個過程，是由各種面向的排除、異己排除和自我排除的過程，也是這三大項排除面向下發展出各種細目的經濟排除、就業排除、福利排除、空間排除……等諸多排除機制運作下的產物，再加上底層階級遂行主流社會所定義的犯罪或偏差行為下，更容易陷入全控機制的司法矯治體系中。

社會排除也將傳統的「經濟邊緣地位」面向帶往「社會關係孤立」的面向，且發展出一套多面向的概念群組（王雲東等人，2007），整理各家文獻來探討社會排除面向，包括勞動市場排除、經濟能力排除、健康排除、文化排除、社會關係排除、社會支持排除、空間上的排除、地區

服務的排除和制度性排除等，更能解釋更生人陷入多面向處境循環的概念。如下分述所示。

一、勞動市場排除：職場就是個人建立社會接觸與人際互動的重要場域（Gordon et al., 2002）。當更生人因低技術或就業障礙，其欲進入或再進入勞動市場，持續就業的機會就相對渺茫，甚至是永久性的被排除。值得注意的是，單一的勞動市場排除不見得會真正導致社會排除，而往往是與其他排除形式一起作用發生的，這種排除將會讓人產生對社會無貢獻、無價值之場域。

二、經濟能力排除：當個人無法透過就業來維持其個人或家庭的最低生活水準，而必須仰賴福利供給或非法管道以獲得經濟資源時稱之為經濟能力排除（劉鶴群，2015）。

三、健康排除：健康排除的操作化意思為更生人成員是否罹患長期性疾病、身心障礙或體弱，若是則稱為健康排除。

四、文化排除：即個人無法根據主流社會所認可的行為模式、生活型態、文化價值等來安排自己的生活，甚至遭受到社會制裁、偏見或歧視的命運。例如一班社會對更生人或社會底層階級的觀感即是一種文化上的排除。

五、社會關係排除：當更生人在社會關係的範圍與品質上，遭遇孤立、疏離、社會聯繫薄弱、只能與少數同為更生人來

往等情況時，基本上就是一種社會關係的排除。伴隨著社會關係排除的，通常有次級連帶關係與次文化認同等現象產生。

六、社會支持排除：Antonucci與Akiyama（1987）也提出，社會支持是分析人與人之間在互動的過程中，社會支持的收授狀況與程度，了解到個體不僅可以成為社會支持的提供者，同時也可以為社會支持的接受者。李孟芬（1993）的研究也指出當個人的非正式的社會支持體系呈現不足時，才向正式社會支持系統尋求替代性、補充性的服務，故指出社會支持區分為工具性支持及情感性支持兩層面，倘若更生人在工具性及情感性支持均無法獲得相對的協助與支持時，即產生社會支持排除。

七、空間上的排除：空間上的排除往往與社會關係排除有很強的聯動關係，當更生人因前述各種排除的發生而導致在行動上與參與上受到限制，造成更生人只能聚居於物質與環境條件相對較差的地區裡，即形成一種地理區位、空間上的排除（張菁芬，2002，2004）。

八、地區服務排除：指出因服務的缺乏或無法負擔來界定為地區服務排除，例如公家服務的社區大學、社區/鄉村的活動中心、郵局、衛生所、公車、火車站與捷運站等與民間的宗教場所、便利商店、銀行、餐廳、電影院、加油站及藥局等服務兩大類（Levitas，2005）。

九、制度性的排除：更生人也容易在不同時期、不同生活面向上遭遇到制度性的排除，尤其是來自學校、教育訓練機構、公私立福利機構、就業輔導單位、銀行等體系的排除，都會讓更生人產生一種不安全感和消極的感受。

三、社會融合

上述社會排除有兩種特性，其一為多面向，指的是貧窮現象並非單指物質的或經濟的問題，還包括心理、價值與社會參與等問題；其次指出社會排除不是一個靜態的描述而已，更是要探索一個人或團體之所以在其生命歷程中，逐漸淪入困境的動態過程。然有別於社會排除，社會融合（social inclusion）是一種動態的過程，而非僅是一種安置的狀態，社會融合的理念，不只是只要安置就好，而是每個個人的需求都應被顧及和滿足，更要強調他們有選擇權和參與權，要在尊重多元性價值下去創造融合的社會（Lindsay, 1997）。社會融合的概念同時也賦予福利權與獨立權的意涵，認為社會融合不僅是作為一種照顧福利取向的政策目標，使弱勢族群或脆弱家庭能獲得一份工作，或社會日常生活參與的機會，更重要的是要讓弱勢族群或脆弱家庭能完全的融合到社會，除了要免於依賴專業照顧者之外，還必須要認知到它們與社會一般人是相互依賴的夥伴，不論是教育、工作與生活，彼此不再

被社會生活空間所隔離（張菁芬，2005，2009）。因此期望透過社會融合使得社會上的弱勢族群或脆弱家庭成員能有尊嚴的生存及創造均等的機會等。

參、社會排除對更生人之限制與影響

犯罪學的研究即是研究犯罪族群，歸納犯罪特質和犯罪成因，然後提出研究發現與理論。而社會排除原本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用以剝奪勞工權力的一個過程，在這裡擴大其意涵，指某個個體或群體被有系統地剝奪自主的能力與權力，事實上，資本主義視為無價值且無政治利益的地區，其生產、消費、溝通機會與資訊的流通則是會跳過這些被區隔地區，而這些被排除的地區及族群，成為被邊緣化的群體（張菁芬，2002），當然更生人的處境就容易陷入這樣的困境中。爰此，整理國內學者所提及社會排除對於更生人的限制與影響，其相關研究整理如下分述之。

一、回不去的社會——更生人的高再犯率

按照鍾宏彬（2017）的研究統計資料分析而言：臺灣於2011～2014年出獄的受刑人迄2015年底的「出獄後（累積）再犯率」統整指出，出獄六個月的再犯率為13%，一年內的再犯率提高到25%，二

年內的再犯率為41%，3年內則為49%，四年內則超過一半，達54%。顯示受刑人出獄後再度回到監所的機率相當高，從累積的速度來看，出獄後二年內是再犯高峰期，也就是刑事政策上應該加強投注資源去輔導更生人復歸社會的關鍵期間（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2021）。

從矯治的觀點來看，入監服刑的「社會控制」或「再社會化」的矯治取向，似乎對於受刑人的高再犯率的下降起不了作用，而更生人的高再犯率勢將嚴重衝擊社會安全機制。矯正機關勢必要思考趨緩入監服刑之受刑人的高再犯率的有效對策的提出的必要性。受刑人一旦服刑期滿出獄或假釋通過而返回社區，伴隨過去違法者的污名化著實難獲得社區的認同和支持，在面臨多重的社會排除困境下，其結果不是淪落為底層社會之人，就是陷入與家人形同陌路的惡性循環之中（Johnson et al., 1988）。

二、被稀釋的福利服務資源

因便於收容人的管理，矯正機關也按《戶籍法》、《矯正機關收容人戶籍管理要點》之規定，對面臨居住排除的收容人變更戶籍至矯正機關以便管理。尤其服刑期滿後的老弱殘更生人在面臨家庭疏離及社會等多重排除困境下，更無能力遷戶籍回原住居縣市。近年來臺灣各縣市政府、更生保護會分會與各民間部門均非常正視

收容人出所後的發展與照顧安置問題並建立相關通報機制，遂也無形增加縣市政府社福資源之負擔及社工人員處理更生人多重排除的壓力，成為縣市的社福負擔，勢將排擠到各縣市的福利運用或稀釋各縣市的老弱殘社會福利資源。故後續在面臨社會排除的更生人之社會安全網計畫修正及經費的寬列等，仍須政府予以正視處理與通盤考量的。

三、社會偏見帶來更生人及其家庭的社會隔離與烙印

個案犯罪之後，除犯罪者入監服刑之外，其家庭成員及子女生活照顧會受到很大的衝擊。不僅對家庭成員和子女是一種嚴重的心理創傷外，另外未入監獄的家庭成員要負起照顧長輩及子女的責任，還需要在鄰里街坊、學校和工作場所等社區生活中承擔污名和排除與隔離（王瑞婉，2003）。更生人出獄後，社會對於更生人的排擠和恐懼與烙印，也是更生人難以重新立足於社會的原因之一。

四、從「社會區隔」到「可以犧牲的生命」

Garland（1985）的研究中提及，美國在1960年代的市區更新計畫中，造就了貧民窟的產生，讓中產階級和貧窮人口分別集中居住於不同的處所，而貧窮人口往往又被安置缺乏就業與便利交通的邊緣地

區，在生態學與人口學因素的交互影響下遂形成了隔離與社會區隔（科司特，1998 / 2001）。這些社會區隔不但打破了社區的集體認同的意識，也動搖了城市低度發展地區或邊緣地區內的社會規範，使得失序、暴力、藥物濫用……等社會問題不斷惡化（加蘭，2002 / 2006）。

Nussbaum的研究也認為汙名化也會帶給被汙名者的傷害，這些傷害包括受到限制的公民權與法律，使被汙名者在居住、工作和參與社會活動上受到限制與歧視（努斯鮑姆，2004 / 2007）。Bauman的研究也同樣認為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的主導下，不僅弱化了國家對社會秩序的主導力量，且政府在財務沉重的負擔下使得福利國家模式的式微，底層邊緣族群常處在經濟秩序的「例外狀態」，使得政府將底層階級形塑為犯罪的及可以被犧牲或忽略的個體（阿岡本，2003 / 2010）。

五、更生人生涯就業的限制

廖滿足（2005）、胡淳茹等人（2020）的研究指出，防止更生人再次犯罪的有效方法之一為就業，且是影響更生人就業困難的原因，更生人就業限制的個人因素很多，諸如教育程度較低，研究指出近八成個案入獄前，其社經地位偏低，且從事體力勞工，甚至是無業或無固定工作者，且在缺乏暫時安置場所或中途之家

的情況下，更生人雖願意工作但需遠離過去入監前的環境的限制（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2017；監察院，2018），且就業技能日新月異，使得更生人在求職過程更形困難。更生人於收容階段所接受職業訓練種類和職業訓練能力不符合社會發展需求、更生人對就業職場認知不足不夠，工作適應力不足夠、人際關係技巧限制、無能力運用資源的能力、以及工作態度不良、不正確的工作態度及價值觀、不良個人習慣等因素，都是個人就業限制（余世禮，2019）。除上述更生人就業個人因素限制之外，其環境限制因素也不少；首先是家庭支持系統失能，導致更生朋友出監後面臨無居所、缺乏就業安置處所及家庭支持系統能量不足等，容易造成更生人走回頭路；其次為雇主接受度低，一般職場對於更生人難免會有刻板印象及烙印化的情況，再則法令保護與限制；且各行各業對於各種刑別的規範限制，律法上的限制，企業主往往要求求職者提供良民證，更大幅度限縮了更生人的求職範圍，造成惡性循環。

肆、未來展望與策略作為

一、從矯治處遇到復健取向

從犯罪矯治的方向來看，即是透過將犯罪者加以監禁可以達到保護社會大眾安全與改變受刑人行為之目的，這是過

去對於犯罪者一貫的處遇方式，但是從1970年代以後，人們開始質疑處罰取向的監禁方式對於受刑人的行為矯治毫無效果，受刑人出獄後故態復萌再度觸法，反而成為社會治安更大的隱憂。許多實證研究也支持這樣的論點，更生人出獄後返回原來的社區中如遇上經濟排除、失業排除、社會關係的排除、社會支持的排除與制度的排除，加上其生活的社區可能充塞貧窮、犯罪、孤立等風因素，導致這些受刑人很快會再度犯罪入獄（Rodriguez & Brown, 2003）。1990年代也隨著實證研究的進步，提出了矯治處遇模式必須加入復建的元素，再犯罪率通常會隨之降低，可以看到這時候美國社會提出許多復健取向的方案，期待透過增加更生人的家庭支持與社區連結，降低因家庭關係斷裂與社會排除導致更生人的自我排除（McGuire, 2002；Wilson et al., 2005）。

美國矯治公司（Correction Corporation of America，美國著名的私人監獄管理公司，2016年後更名為Core Civic）（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 2016）的資料顯示，復健取向的矯治處遇有三：首先為「出獄前的輔導」，獄方為即將出獄的受刑人規劃個別處遇計畫，提供其所需的教育、就業、戒治與人際等課程，為出獄作準備；其次為「出獄轉銜輔導」，觀護人或假釋官在受刑人即將出獄時協助更生人轉銜至社區中生活，除了告

知各項觀護或假釋應該遵守的規定外，也提供有關住宅、福利等需求的聯絡單位和方式；最後為「復歸社區輔導」，司法及更生輔導單位及民間單位等共同協助出獄的受刑人復歸社區，協助更生人所需的各項生活所需的取得，例如就業轉介、家人支持及社會網絡等。上述三階段的服務措施，的確也產生了具體的成效。所以美國在復健矯治處遇中的成效遂成為我國在社區復健矯治處遇工作可以借鏡及學習效仿之處。

二、家庭支持與復歸社區

過去監獄的目的是監禁及處罰犯罪者，作為保障公共安全的處所，但近年來，矯治的策略也開始強調受刑人與家人溝通的重要性。從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也發現，重建家庭關係對於出獄的受刑人和其家人能夠產生正向的支持功能，即在重建家庭關係下，可以增加出獄的受刑人更願意參與各項處遇方案，追蹤再犯率時也發現，在家庭成員的支持下，更生人重複入監的比率明顯下降（江振亨，2003；胡淳茹等人，2020；DeLisi & Conis, 2010），故家庭支持無疑是對更生人能順利的復歸社會及社會融合最大的力量。

法務部於中華民國2014年02月20日法保字第10305501160號函頒《推動辦理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務方案》迄今，結合各社會團體，共同推動強化監所收容人

及更生人家庭支持網絡，透過家庭支持與接納，重建更生人支持網絡，裨益更生人能順利復歸社會，減少再犯。其執行內容首要為收容人返家服務：即收容人家庭教育與家庭支持團體、收容人返家準備服務、收容人返家後追蹤及收容人懇親活動等；其次為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務：即更生人家內因家庭功能喪失或衝突、藥癮或酒癮、貧困、隔代教養或失業、負擔家計者出走等因素，積極協助促進更生人及其家庭正常運作，解決更生人及其家庭成員面臨之生活適應、經濟、就業、社會支持、勞動市場、經濟能力、社會關係、社會支持、空間上、地區服務和制度性等排除問題（法務部，2014）。故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執行經年下來，頗具具體成效，研究指出，受刑人如果有較強³的家庭關係，比較不會學習惡質的犯罪行為方案對於受刑人之情緒穩定、收容安全及將來出獄後之社會適應有所助益（胡淳茹等人，2020），也可大幅降低重複入監的窘境，故賡續透過公私單位及機構的協力協助執行家庭支持方案及社區復健多元方案，更能呈現具體輔導效果。

三、增強更生人就業輔導機制

在缺乏暫時安置場所或中途之家的情況下，有些更生人雖願意工作但需遠離過去入監前的環境（監察院，2018），在居住及居住區服務的排除下，更生人不得

不選擇放棄。且現有的更生人就業輔導機制，大多是辦理職業技能訓練、就業講座與雇主座談為主，未能對各就業服務中心訂出安置就業之實質標準，更生人在矯正機構內與司法保護的保護管束期間，職業訓練應該接軌，且應符合就業市場之未需求；在就業媒合時，可提供有意願僱用更生人之廠商，先至監獄內辦理即將出監之受刑人之就業媒合，或由勞政單位提供即將出獄的更生人就業機會（周悌嫻等人，2014）；其次除鼓勵就業輔導員主動開拓就業機會和媒合就業外，對雇主願意僱用更生人訂立獎勵措施，以增加雇主聘用更生人之意願；再者應考量增加就業機會提供的雇主免（減）稅的獎勵或實質的獎金獎勵等。

四、強化地方政府執行能力

衛生福利部已經補助地方政府《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相關的社工人力，各地方政府建立集中篩派案中心，派案後由公部門社工確實進行案件評估與調查，並透過自辦或委辦民間團體的方式發展多元服務方案（衛生福利部，2020），來強化對更生人與其家庭的支持。又得持續追蹤曾服務或轉介的更生人及其家庭的服務，並重建更生人的支持網絡，使更生人能順利復歸社會。

五、建構更生人友善的環境

社會一般大眾對更生人的汙名化與刻板印象，這也使得更生人復歸社會面臨諸多的掙扎與阻力，社會支持薄弱加上先前提到的經濟與就業等各種排除，再加上家庭支持不足的困境，都是使得更生失敗，進而再犯的主因。現有的更生人的保護與輔導工作僅偏向以更生人個人為處置焦點，未能對去除社會排除、烙印及偏見的作為做全面性規劃。故透過積極性與多元整合服務模式的倡導措施或推動必要的社會運動，對去除負面社會刻板印象上應對更生人順利復歸社會有極大的助益。

伍、結語

更生人的就業、家庭適應與社區復健需求，是一個長期個人與環境的結構因素下交互影響的複雜問題。在陪伴更生人及其家庭的過程中，尤其生活或所處環境出現不同形態的風險警訊時，能避免發生多重的社會排除狀態，需根據需求提供公私部門工具性正式資源連結與協助，建構綿密的社會安全支持及防護網，並增加社會網絡的聯結提供就業輔導與家庭支持等社區復健服務，進而能夠促進更生人及其家庭的社會參與與融合，來建構完整的更生人社會安全防護網。

（本文作者為國立空中大學臺東學習指導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關鍵詞：更生人、社會排除

參考文獻

- 王雲東、楊培珊、黃竹萱（2007）。〈臺灣地區年長榮民生活照顧與婚狀況的研究——社會排除觀點的初探〉。《東吳社會工作學報》，17，33-64。<https://doi.org/10.29734/SJSW.200712.0002>
- 王瑞婉（2003）。〈隱藏的家庭——受刑人家庭現況初探〉。載於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編），《2003兒童少年保護——從家庭做起國際學術研討會實錄論文集》（頁253-276）。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 加蘭（Garland, D. W.）著（2006）。《控制的文化：當代社會的犯罪與社會秩序》（周盈成譯）。巨流。（原著出版年：2002）
- 江振亨（2003）。〈從「受刑人家庭支持方案」模式談社會工作理念在矯治機構之運用〉。

- 《社區發展季刊》，103，275-285。
- 余世禮（2019年9月2日）。〈幫他重新站起來！——更生人的就業困境與法律需求〉。
- 2021年11月7日檢索自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https://www.laf.org.tw/index.php?action=LAFBaoBao-detail&tag=242&id=233>
- 努斯鮑姆（Nussbaum, M. C.）（2007）。《逃避人性：噁心、羞恥與法律》（方佳俊譯）。商周。（原著出版年：2004）
- 李孟芬（1993）。〈臺灣老人的非正式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度之關係研究〉。載於李孟芬（主編），《臺灣地區老人保健與生活研究論文集（第一輯）》（頁5-1-5-25）。臺灣省家庭計畫研究所。
- 周榛嫻、侯崇文、曹光文（2014）。《更生人就業調查成果報告書》。法務部。<https://www.moj.gov.tw/media/4736/792510345881.pdf?mediaDL=true>
- 林信華（2002）。《文化政策新論：建構臺灣新社會》。揚智。
- 法務部（2014）。《推動辦理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務方案》。<https://www.moj.gov.tw/media/21347/法務部推動辦理更生人家庭支持及援助家庭服務方案1101117修正版.pdf?mediaDL=true>
- 阿岡本（Agamben, G.）（2010）。《例外狀態》（薛熙平譯）。麥田。（原著出版年：2003）
- 科司特（Castells, M.）（2001）。《千禧年之終結》（夏鑄九、黃慧琦譯）。唐山。（原著出版年：1998）
- 胡淳茹、吳慧菁、賴擁連、郭倩宜（2020）。〈女性藥癮更生人社區復歸服務系統之現況分析〉。《藥物濫用防治》，5（2），25-54。[https://doi.org/10.6645/JSAR.202006_5\(2\).2](https://doi.org/10.6645/JSAR.202006_5(2).2)
- 孫碧霞（2018）。〈社會排除與社會融合：比較歐盟與台灣的政策〉。《人文與社會學報》，3（7），49-76。
-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2017）。《更生人就業狀況調查成果報告》。法務部。<https://www.after-care.org.tw/upload/cht/attachment/3ef23742edff0ce256a274f94e69a714.pdf>
- 張菁芬（2002）。《經濟全球化對臺灣社會安全政策的衝擊與回應之研究：社會排除觀點》（計畫編號：NSC90-2420-H126-001）。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685263>
- 張菁芬（2004）。〈空間的排除與區域網絡服務模式——以社子地區為例〉。《社區發展季刊》，106，271-284。
- 張菁芬（2005）。《社會排除現象與對策：歐盟的經驗分析》。松慧。
- 張菁芬（2009）。《臺灣地區社會排除之研究》。松慧。
- 廖滿足（2005）。《更生事業僱用更生人就業之管理現況研究》（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hdl.handle.net/11296/y97gh3>
- 監察院（2018）。《法務部防止更生人再犯及其就業輔導機制通案性案件調查研究報告》。

- https://www.cy.gov.tw/AP_Home/Op_Upload/eDoc/%E5%87%BA%E7%89%88%E5%93%81/1071070000041010700877p.pdf.pdf
- 劉慧冠（2020）。〈強化社會安全網——以脆弱家庭自立脫貧計畫為例〉。《社區發展季刊》，172，300-310。
- 劉鶴群（2015）。〈社會排除、貧窮與就業：現象描述與政策意涵〉。《社區發展季刊》，151，163-184。
- 衛生福利部（2018）。《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核定本）》。 <https://www.mohw.gov.tw/dl-56324-d4d9a633-75e4-4b7a-86a4-064cefaaf5e6.html>
- 衛生福利部（2020年5月6日）。〈我國社會安全網運作之現況與策進作法〉（專題報告）。立法院第10屆第1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23次全體委員會議，臺北市，中華民國（臺灣）。
- 衛生福利部（2021）。《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110-114年）》。 <https://www.mohw.gov.tw/dl-71048-082a6fbf-b202-4c4d-a82a-5ff78f39d4e9.html>
- 鍾宏彬（2017年3月27日）。〈我國的再犯率與監獄矯治效能——初探〉。2023年11月18日檢索自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https://www.jrf.org.tw/articles/1255>
- Antonucci, T. C., & Akiyama, H. (1987). Social networks in adult life and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the convoy model.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2(5), 519-527. <https://doi.org/10.1093/geronj/42.5.519>
- Bauman, Z. (1998). *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 Polity.
- Brown, B., Campbell, R., Wilson, J. A., Cheryachukin, Y., Davis, R. C., Dauphinee, J., Hope, R., & Gehi, K. (2005). *Smoother the path from prison to home*. 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
- 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 (2016, June 01). *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 on pre-release and reentry services*. <https://ccamericastorage.blob.core.windows.net/media/Default/documents/CCA-Resource-Center/09-0910-ResearchInstitute-WhitePaper.pdf>
- DeLisi, M., & Conis, P. J. (2010). *American corrections: Theory,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Jones and Bartlett.
- Garland, D. (1985). *Punishment and welfare: A history of penal strategies*. Ashgate.
- Gordon, D. (2002). The International Measurement of Poverty and Anti-poverty Policies. In P. Townsend & D. Gordon (Eds.), *World poverty: New policies to defeat and old enemy* (pp. 53-80). Polity. <https://doi.org/10.51952/9781847425560.ch003>
- Johnson, T., Selber, K., & Lauderdale, M. (1988). Developing quality services for offenders and families: An innovative partnership. *Child Welfare*, 77(5), 596-615.
- Levitas, R. (2005). *The inclusive society: Social exclusion and new labor*. Macmillan. <https://doi.org/10.1057/9780230511552>
- Lindsay, G. (1997). Are we ready for inclusion. In G. Lindsay & D. Thompson (Eds.), *Values into*

practice in special education (pp. 89-104). Davis Fulton.

McGuire, G. M. (2002). Gender, race, and the shadow structure: A study of informal networks and inequality in a work organization. *Gender & Society*, 16(3), 303-322. <https://doi.org/10.1177/0891243202016003003>

Rodriguez, N., & Brown, B. (2003). *Preventing homelessness among people leaving prison*. The Vera Intitute of Justice. https://www.prisonpolicy.org/scans/vera/209_407.pdf